

简论鲜卑汉化与北朝兴衰

李春玲

(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, 辽宁 朝阳 122000)

摘要: 鲜卑兴衰与北朝兴衰同步, 走着鲜卑汉化、统一北方, 北方统一、鲜卑消失的历史道路。公元439年, 鲜卑拓跋部所建北魏翦灭鲜卑慕容部、乞伏部、秃发部, 统一北方。孝文帝改革是鲜卑拓跋部汉化成功的范例, 但迁都洛阳后的一些改革不彻底, 给北魏带来严重恶果, 导致分裂。鲜卑宇文部为求生存、求发展, 实行改革以自强, 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族融和, 灭掉北齐, 融入先进的、更大的民族大家庭。

关键词: 鲜卑汉化; 北朝兴衰; 鲜卑消亡

[中图分类号] K239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3-6547(2008-07-0107-03)

通常说,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, 西晋末年, 聚居北方的五大少数民族——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, 纷纷起而建立各自的政权。自公元303年李特自署益州、改年建初, 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的136年间, 各族首领先后建起成汉、二赵(前赵、后赵)、三秦(前秦、后秦、西秦)、四燕(前燕、后燕、南燕、北燕)、五凉(前凉、后凉、南凉、北凉、西凉)和夏等16个政权, 史称“五胡十六国”。此外, 另有冉魏、西燕与北魏的前身——代。其中, 鲜卑的兴衰, 与北朝兴衰同步, 走着鲜卑汉化、统一北方, 北方统一、鲜卑消失的历史道路。具体表现为: 拓跋部汉化建立北魏, 统一北方; 北魏分裂后, 宇文部建立北周, 实行汉化, 灭掉北齐, 鲜卑逐渐消亡, 为隋唐统一奠定基础。

一

鲜卑为东胡一支, 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, 分保鲜卑山, 因以为号。至东汉初, 逐渐强盛起来, 雄踞塞北。东汉末, 一度“南抄汉边, 北据丁令, 东却夫余, 西击乌孙, 尽据匈奴故地, 东西万二千余里, 南北七千余里, 网罗山川、水泽、盐池甚广。”^{〔1〕}西晋时, 拓跋部、慕容部、宇文部、乞伏部(陇西鲜卑)、秃发部(河西鲜卑)势力“分拒地险”, “分鏖起乱”。拓跋部建代、北魏, 慕容部建前燕、后燕、西燕、南燕, 乞伏部建西秦, 秃发部建南凉。慕容部所建前燕、南燕、拓跋部所建代, 归于东晋。慕容部所建后燕、西燕, 归于北魏。乞伏部所建西秦、秃发部所建南凉, 归于吐谷浑。

登国元年(386)正月, 拓跋珪即代王位, 建元。四月, 改称魏王, 北魏始建国。皇始元年(396)七月, 拓跋珪建天子旌旗, 改元。三年(399), 定都平城。十二月, 拓跋珪称帝, 改元天兴, 是为道武帝。经明元帝拓跋嗣, 至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(439)统一北方。至此, 鲜卑慕容部、乞伏部、秃发部势力, 基本为拓跋部翦灭。

二

在北方内迁五大少数民族中间, 鲜卑族是最落后的一个民族, 而拓跋部又是鲜卑族中最落后的一支。在拓跋珪建国时, 仍然具有部落联盟的遗痕。部落酋长权势很大, 各部落叛降无常。然而, 落后的征服者往往被所征服地区的先进文明所征服, 这又是不可改易的铁则。

早在拓跋部进入中原地区的时候, 就与中原皇朝发生密切联系, 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进入其活动地域, 使其逐步受到影响, 经济生活开始有所变化, 农业所占比重日益加大。经济生活的变化, 促使其较易接受汉族的文明。但是由于拓跋部的落后, 除了民族分野之外, 无论统治思想、统治方式, 还是剥削方式, 依然与汉族权贵存在很大矛盾。到孝文帝时, 拓跋部内部贫富分化与对立更趋明显, 拓跋贵族大量圈占土地, 一般拓跋成员及汉族“新民”日益丧失土地, 平城一带流民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二。不仅社会治安受到威胁, 就连政权稳定也受到挑战, 兵源大成问题, 昔日所依靠的力量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敌对势力。孝文帝及其祖母文明冯太后决定改弦易辙, 在经济领域实行均田制度, 在政治领域迁都洛阳、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。

均田制度, 包括均田、三长和新的赋役制等三方面的内容, 具有将土地、劳力、赋役三者紧密结合的特点。均田是基础, 三长制是行政保障手段, 赋役是目的。均田制度实施后, 内迁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都成为与汉族一样的均田民, 同样的经济地位、同样的经济生活, 促进了彼此间的融合。

迁都洛阳, 是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, 对北魏的兴盛至关重要。拓跋部崛起代北, 以游牧为主, 定都平城(今山西大同)不失为高明之举。但随着统一北方, 统治重心转向中原。均田制度的推行, 使拓跋部封建化进一步加深, 改变鲜卑旧习, 改革落后的政治体制, 势在必行。然而, 平城闭塞, 交通不发达, 文化也落后, 又是鲜卑贵族聚居之地, 改革阻力极大, 作为都城再难适应新的形势。孝文帝与任城王

的一段对话说得再明白不过。孝文帝说：

国家兴自北土，徙居平城，虽富有四海，文轨未一，此间用武之地，非可文治，移风易俗，信为其难。崑、函帝宅，河、洛王里，因兹大举，光宅中原。

任城王答：

伊、洛中区，均天下所据，陛下制御华夏，辑平九服，苍生闻此，应当大庆。”^{〔2〕}

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争议，至太和十八年（494）三月新建洛阳城大体告成，十月正式迁都。此后，一直有反对意见，甚至引发举兵叛乱。孝文帝不得不放慢迁都速度，允许拓跋贵族冬居洛阳、夏还代北，成为往返洛阳与平城间的所谓“雁臣”。孝文帝一死，又有保守势力煽动宣武帝还都平城，但终因“北来迁人，安居岁久，公私计立，无复还情”，^{〔3〕}少数“邪臣不然之说”未能如愿。

迁都是为了摆脱保守贵族，大力推行改革措施。迁都的实现，使得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推出，是比迁都更深层次的改革，包括语言、风俗习惯、政治制度各个方面，全都模仿汉族，习惯上称之为“汉化”。

太和十八年十二月，革衣服之制，禁穿胡服，“国人多不悦”。次年五月，孝文帝责问留守官：“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，卿等何为不遵前诏？”众官“皆谢罪”。

此前，拓跋部军中使用鲜卑语，官场中混用鲜卑语、汉语，以鲜卑语为主。随着汉族士人在官吏队伍中的比重增加，特设“译令史”这一翻译官。除民族隔阂外，行政运行也多所不便。鲜卑有语言没文字，鲜卑官员需得习汉文。随着封建化的加深，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基础，儒家典籍成为培养鲜卑新贵的依据，语言和文字的矛盾日渐突出。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，不解决语言问题，一切改革鲜卑旧习的设想都难以实现。太和十九年（495）五月，孝文帝问众臣：

今欲断诸北语，一从正音。其年三十已上，习性已久，容不可猝革。三十已下，见在朝廷之人，语言不听仍旧；若有故为，当家降黜，各宜深戒！王公卿士以为然不？

众臣对曰：“实如圣旨。”所谓“正音”，即汉语。六月下诏：“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，违者免所居官。”同月，下诏改革丧葬旧俗：“迁洛之民死，葬河南，不得还北。”从此，“代人迁洛阳者悉为河南洛阳人”。^{〔4〕}又改用长尺、大斗，其法依照《汉书·律历志》规定。八月，在洛阳立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。

太和二十年（496）正月下诏改鲜卑姓，以“北人谓土为拓，后为跋。魏之先出于黄帝，以土为德，故为拓跋氏。夫土者，黄中之色，万物之元也；宜改姓元氏。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，姓或重复，皆改之。”改拓跋氏为长孙氏，达奚氏为奚氏等。同时改族姓，详见《魏书·官氏志》。鲜卑的穆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于、嵇、尉八姓，“一同”汉族的卢、崔、郑、王“四姓”，彼此联姻，将胡汉贵族集成为一个统治整体。

实行“汉化”的改制，还有改官制、官吏选拔制，改郊庙祭祀礼仪制，改律令以及诏罢袒裸旧习等。

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，促进民族融和，是顺应历史潮流

之举，也是鲜卑族“汉化”的过程。三四十年之后，南朝梁人乘北魏内乱初入洛阳时还带有一种蔑视的态度说：“魏朝甚盛，犹曰五胡，正朔相承，当在江左，泰皇玉玺，仅在梁朝。”但居住几个月以后，竟自愧不如，回到南朝后作这样的传扬：

自晋、宋以来，号洛阳为荒土，此中谓长江以北，尽是夷狄。昨至洛阳，始知衣冠士族，并在中原。礼仪富盛，人物殷阜，目所不识，口不能传。所谓帝京翼翼，四方之则。始如登泰山者卑培楼，涉江海者小湘、沅。北人安得不重！

认识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恰恰说明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久，北方民族融合基本形成，鲜卑族逐渐融入新的民族大家庭，以致“江表士庶，竞相楷模，褰衣博带，被极秣陵（建康）”。^{〔5〕}

孝文帝改革是鲜卑拓跋部汉化成功的范例，然而迁都洛阳后由于一些措施不彻底，给北魏政权带来严重的恶果，最终导致分裂。

随着北方统一，鲜卑族昔日的马上进取精神日渐消失，胡汉贵族取得累世公卿的特权，腐朽速度加快。孝文帝晚年，出现朝廷职能部门职分错乱、互相推诿、地方官员不亲民事的种种迹象。卖官鬻爵，公然而行。元晖、卢昶典选事，规定大都刺史二千匹、次都刺史一千匹、小都刺史五百匹，其余官吏各有定价。因此，时人称元晖为“饿彪将军”、卢昶为“饥鹰侍中”、吏部为拍卖职爵的“市曹”。^{〔6〕}至于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兼并土地、垄断工商、圈占山泽等，更是怵目惊心。河间王元琛甚至与西晋末年石崇夸富相比，说：“不恨我不见石崇，恨石崇不见我！”^{〔7〕}这种扭曲心态得不到及时纠正而肆意蔓延，难免不造成亡国之忧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原先“代民之洛，始欲向尽”，^{〔8〕}即把拓跋部成员全部迁往中原的计划没有彻底实现，相当数量的拓跋部民留居原地。迁洛进入中原的，进入汉族的汪洋大海，迅速与汉族融合，语言、习俗完全汉化，甚至忘记昔日使用的语言，以致需要翻译进行沟通。然而，留居代北者，则“怀本乐故”，^{〔9〕}保留着改制前的语言和习俗。拓跋部民分为迁洛和留代两大部分，逐渐形成两大集团。后一种情况，在北方边镇地区尤为明显。

北魏初年，为了抵御柔然，捍卫京师平城，自平城以北至今河北张北一线，设置六大军镇。最初，镇将大都从拓跋皇室或亲信中选拔，镇兵则有拓跋成员或中原强宗子弟充任。同时，征集被征服的高车、敕勒、匈奴、契胡等游牧民族补充兵源。六镇官兵被视为“国之肺腑”，寄以“爪牙重任”，享有若干政治、经济特权。这一地区，鲜卑语和鲜卑习俗仍然占据统治地位，久居此地的其他各族逐渐为鲜卑所融合而鲜卑化。随着迁都洛阳，六镇捍卫京师的重要地位不复存在，六镇镇将、镇兵的身份急剧下降。加之大量罪犯被发配来充当镇兵，镇将、镇兵不仅仕进无缘，就连基本生活也没有着落。镇将还可以凭借手中权力贪占肥饶之地，镇兵甚至连瘠土荒地也难获得，不得不听凭镇将驱使和奴役。改制不仅没有给曾经是“国之肺腑”的六镇带来任何实际利益，反而加剧了六镇的种种矛盾，使得六镇军民对改制怀有一种特别的仇恨，深藏着导致北魏衰败的重重杀机。

三

正光四年(523),一场撼动北魏统治的六镇起义爆发了。历时六年零十个月,至普泰元年(531)起义失败。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因此激化,高欢称霸关东,宇文泰称霸关西,公元534年分别拥立元见善、元宝矩为帝,北魏分裂为东魏、西魏,随后又为北齐、北周取代。

高欢,自称渤海高氏之后,“累世北边,故习其俗,遂同鲜卑”,^[10]因而尽量迎合六镇鲜卑反对汉化、迷恋旧习的心理。军中号令,一律用鲜卑语。依赖、放纵鲜卑勋贵,使其博得六镇鲜卑的支持,为其奠定东魏——北齐基业的重要原因。然而,在东魏——北齐政权下,汉族世家大族地位一直很低,史称“于时,鲜卑共轻中华朝士”,^[11]必然造成胡汉权贵之间的权势之争。天保元年(550),高洋取代东魏称帝,建立北齐,鲜卑勋贵势力大涨,胡、汉争夺更加激烈。高洋死后,高殷继位,在鲜卑势力支持下,高演废高殷,汉官地位日渐低落。高演死后,高湛继位,鲜卑勋贵势力进一步发展,汉族士人被斥骂为“狗汉”、“贼汉”。鲜卑恩幸韩凤经常大骂:“恨不得啖汉狗饲马”,“刀只可刈贼汉头,不可刈草!”“汉狗大不可耐,唯须杀却!”^[12]接连不断的杀戮,北齐朝中汉族官员所剩无几,胡汉矛盾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再加之勋贵集团、恩幸集团的狗咬狗的撕咬,“其朝政昏乱,政由群小,百姓嗷然,朝不谋夕”,^[13]完全是一幅自取灭亡的景象。

宇文泰,为北朝后期鲜卑宇文部首领,亦六镇鲜卑一部分。但与高欢不同的是:高欢可以凭借六镇鲜卑20万众,宇文泰却只有武川军5万人,军力悬殊;高欢占有关东,地广人众,经济发达,宇文泰占有关系,地瘠民贫。处于弱势的宇文泰,为求生存、求发展,只有实行改革以自强,才是其唯一的出路。

拥立西魏文帝仅三个月,宇文泰即重用“爱民如慈父,训民如严师”的苏绰“制文案程式”,推行军国开支记账制和扩大赋役来源的户籍法。史称宇文泰“方欲革易时政,务弘强国富民之道,故(苏)绰得尽其智能,赞成其事。减官员,置二长,并置屯田以资军国。”苏绰又作“六条诏书”,大统七年(541)九月奏请施行:先治心,敦教化,尽地利,擢贤良,恤狱讼,均赋役。宇文泰“甚重之,常置诸座右”,令百官习诵,“牧守令长,非通六条及记帐者,不得居官”。虽然西魏——北周的赋役仍然相当重,但推行均田制却比东魏——北齐好得多,因而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,吏治在当时的割据政权中也最好。在文物制度方面,东魏——北齐据中原,自以为正统。西魏——北周据关陇,经济上实行均田足以自给,军事上也与东魏——北齐力量相当。但其门望不如中原,文化不如江南。除了整军务农、力图富强,必须有自成一系的制度和他文化,既能辅助其整军务农的政策,又能维系关陇辖境内各族之人心,使其融为一家。大统十一年(545)六月,苏绰奏行《大诰》,文体准《尚书》,“自是之后,文笔皆依此体”。^[14]宇文泰又采纳卢辩建议,“依

《周礼》建六官,置公、卿、大夫、士,并撰次朝仪”,“恭帝三年始命行之”,^[15]政权建设得以加强。史书称宇文泰“知人善任使,从谏如流,崇尚儒术,明达政事,恩信被物,能驾驭英豪,一见之者,咸思用命”,^[16]虽有溢美之嫌,但通过任用苏绰、颁行六条诏书等实例来看,并非全为虚言妄语。公元557年,宇文觉称帝,取代西魏,是为北周闵帝。随即明帝继位,“礼貌功臣,敦睦九族,率由恭俭,崇尚文儒”,“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,刊校经史”,被誉为“有君人之德者”。^[17]至于周武帝宇文邕,在恢复经济、发展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节俭,常常以北齐做比照:伪齐叛涣,“世纵淫风,事穷雕饰”,“以暴乱之心,极奢靡之事,有一于此,未或弗亡。朕菲食薄衣,以弘风教,追念生民之费,尚想力役之劳。方当易兹弊俗,率归节俭。”在放免奴婢方面,也可以看出与北齐的差异。高欢、宇文泰都是依靠六镇鲜卑建立起来的霸权,随着军事征服,东魏——北齐,奴婢数量急剧增加。高欢之子高澄,被没为奴婢的战俘刺杀,足以说其矛盾的尖锐。而北周武帝相反,自保定五年(565)六月下令放免奴婢,仅《周书·武帝纪》所纪就有五次。建德六年(577)十一月诏:“自永熙三年(534)七月已来,去年十月已前,东土之民,被抄掠在化内为奴婢者;及平江陵之后,良人没为奴婢者:并宜放免。所在附籍,一同民伍。”^[18]就是说,北魏分裂以来的战俘奴婢,均在放免之列。民间放免奴婢为依附民的现象屡屡出现,显然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。尽管历来对周武帝毁佛有不同看法,但在当时却多认为是“强国富民之上策”,^[19]《广弘明集·叙任道林辩周武帝初佛法诏》亦云:“自废(佛)以来,民役稍稀,租调年增,兵师日盛。东平齐国,西定妖戎,国安民乐,岂非有益。”

北周接受先进生产方式、先进文化,荡涤腐朽的生活方式、没落的风俗陋习,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族融和,终于灭掉北齐,为中国历史上统一、兴盛时期——隋唐——的到来奠定下初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三国志(卷30)·鲜卑传·引魏书。
- [2] 魏书(卷19)·任城王元澄传。
- [3] 魏书(卷15)·元晖传。
- [4] 资治通鉴(卷140)·齐纪6·明帝建武二年。
- [5] 洛阳伽蓝记(卷2)·城东景宁寺。
- [6] 北史(卷15)·常山王遵附传。
- [7] 洛阳伽蓝记(卷4)·城西法云寺。
- [8] 魏书(卷65)·李平传。
- [9] 魏书(卷9)·肃宗纪。
- [10] 北齐书(卷1)·神武纪。
- [11] 北齐书(卷21)·高昂传。
- [12] 北史(卷92)·韩凤传。
- [13] 周书(卷9)·武帝纪。
- [14] 上引均见周书(卷23)·苏绰传·“六条诏书”“始奏行”时间,据资治通鉴(卷158)。
- [15] 周书(卷24)·卢辩传。
- [16] 周书(卷2)·文帝纪。
- [17] 周书(卷4)·明帝纪及“史臣曰”。
- [18] 周书(卷6)·武帝纪下。
- [19] 广弘明集(卷7)·叙历代王臣滞惑解。

责任编辑:邱枫